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伯纳德特集

张 辉 ● 主编



[美] 伯纳德特 (Seth Benardete) ● 著

情节中的论辩

——希腊诗与哲学

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Essays on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严蓓雯 蒋文惠 等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伯纳德特集

张辉●主编



情节中的论辩

——希腊诗与哲学

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Essays on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美] 伯纳德特 (Seth Bernardete) ● 著

严蓓雯 蒋文惠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节中的论辩: 希腊诗与哲学/(美)伯纳德特(Benardete, S.)著;严蓓雯、蒋文惠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经典与解释·伯纳德特集)

ISBN 978-7-5675-4272-3

I. ①情… II. ①伯… ②严… ③蒋… III. ①诗歌研究-希腊 ②哲学思想-研究-希腊
IV. ①I545.072 ②B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1327 号



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 Essays on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By Seth Benardet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nna Burger and Michael Davis

Copyright © 2000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9-701 号

伯纳德特集

情节中的论辩——希腊诗与哲学

著 者 (美)伯纳德特
译 者 严蓓雯 蒋文惠 等
审读编辑 戴连焜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8.5
字 数 42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4272-3/B·982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伯纳德特集”出版说明

与许多伟大天才具有相同的命运,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1932-2002)的重要性,在他身后才格外彰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将长久不可磨灭。

正像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曼斯菲尔德(H. Mansfield)在“悼词”中所说,作为一个古典学者,特别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伯纳德特生前并不为知识界所普遍了解,他本人似乎对获得某种赫赫声名也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又无疑是我们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思想家(the most learned man alive, and the deepest thinker as well)。或者如另一位学者伯格(Ronna Burger)所言,他的一生,便是哲学式生活的楷模。

从1965年起,伯纳德特就在纽约大学(NYU)任教。在教书和研究的40年中,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古希腊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上。逝世前一周,他还在为大家讲授柏拉图的《欧蒂德谟》(*Euthydemus*)——而这篇对话录,据说是仅剩的、少数他所没有讲授过的柏拉图对话录了。像他的伟大老师施特劳斯一样,他试图用那些“伟大的书”作为一面镜子,为平庸的现代世界,寻找到真正的、不可回避的对照;为实用而虚无的人生,提供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严格而持久的学术苦修上的。伯纳德特对古代语言和古代文本天才的把握,甚至不得不使他的“宿敌”——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会长罗森(Stanley Rosen)叹服。法国著名学者维达—那克(Pierre Vidal-Naquet)也认为,在这方面:“他堪获得荷马的英雄般的荣耀。”而伯纳德特涉足的广泛领域,更是当代学界少有人可以匹敌。1953年完成关于柏拉图的《忒阿格斯》(Theages)的硕士论文、1955年又完成关于荷马史诗的博士论文之后,他不仅翻译和疏解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戏剧;发表了关于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论文和专著;而且,还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柏拉图对话录——从《王制》、《会饮》到《法义》等等,在翻译基础上写了非常耐人寻味的评注。他对现有学科界限的超越,代表了一种学术和精神的高度,一种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历史、文学、哲学……诸多知识领域,在他的经典研究中精彩地融会贯通,而远非各自为政。

本系列从伯纳德特大量论文、专著和对话录中编选出11卷,向汉语知识界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沉静而深刻的哲人的不朽思想。他对生活的悲剧与喜剧进行“情节论辩”的高超功力,他在体察“道德与哲学的修辞术”时所表现出的见微知著的惊人智慧,他与古代圣贤相遇并对话的奇特方式,以及他始终不渝的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问,都将令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我们反躬自省。阅读伯纳德特,不仅会启发我们重新体认伟大的古代诗学传统,而且将对我们重新估量那些被现代学问与生活方式所遮蔽乃至毁坏的一切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戊组

2010年7月

目 录

前言 / 1

致谢 / 4

导言 / 5

第一部分：论神话诗

一、最初哲学的最初危机 / 23

二、阿喀琉斯与《伊利亚特》 / 38

三、狄奥墨得斯的英勇与《伊利亚特》的情节 / 65

第二部分：论雅典肃剧

四、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 / 103

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 114

六、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 / 131

七、论希腊悲剧 / 152

第三部分：论柏拉图的对话(上)

八、自然学与希腊悲剧：论柏拉图的《克拉提洛斯》 / 219

九、论柏拉图的《会饮》 / 247

十、普罗泰戈拉的神话和逻各斯 / 270

十一、论柏拉图的《吕西斯》 / 284

十二、释论柏拉图的《卡尔米德》 / 327

十三、柏拉图的《拉克斯》：定义问题 / 359

第四部分：论柏拉图的对话(下)

十四、论柏拉图的《斐多》 / 387

十五、柏拉图的《泰阿泰德》：逻各斯的进路 / 409

十六、论柏拉图的《智术师》 / 440

十七、柏拉图《治邦者》的谋篇 / 477

十八、论《蒂迈欧》 / 504

第五部分：余 论

十九、论智慧与哲学 / 531

二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 / 544

伯纳德特著作选 / 557

索引 / 561

前 言

严蓓雯 译

[vii]有很多理由欣然欢迎伯纳德特的文选面世。他对古希腊诗与哲学的论述,其涵盖的范围,几乎无人能够匹敌。尽管伯纳德特像精通荷马那样精通希罗多德,像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精通索福克勒斯,但他从不羞于缩窄自己的治学范围,即便他对所解文本的论述已极其卓著。因为他从不事先确定论说哪位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诗人,所以,他向他们所说的一切敞开,小心翼翼地追随着他们的论述,这种细致来自这样一种期待:这些作者会教给他所有。

这里所选的论文是伯纳德特三十多年工作的结晶,从对《伊利亚特》(*Iliad*)的研究——他的学位论文题目——到近期对柏拉图的《泰阿泰德》(*Theaetetus*)、《智术师》(*Sophist*)与《治邦者》(*Statesman*)的重新思考。其中有些文章是根据讲座整理成文,在此第一次发表;其他一些曾经在其他书中出现过,但那些书早已绝版。我们一直认为,把这些文章集成一册,不仅将使我们更有可能接近伯纳德特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对难解文本的最具启发性的评注,而且,这也可以提供一种让读者进入伯纳德特著作世界的有益方式。

伯纳德特的真知灼见呈现出各种形式:有时他通过一些悖论

性的陈述表达洞见;有时他运用双关语、语源学、字面义的隐喻引申——这恰是他所解文本所用的行文方式——等微妙的语言分析来展开论证;有时他又采用他思想中饱含的柏拉图式的戏谑手法。以此种种方式,伯纳德特的解经力图得获“情节的论辩”(the argument of the action)——这是此本文集的书名^①——而正是出于这种能力,伯纳德特的解经为人们似乎熟知的解经工作开启了一个相当崭新的角度。当然,伯纳德特非凡的写作特色也是其文艰涩的原因,它拒绝简单化。他对像柏拉图《王制》(*Republic*)这样的宏篇巨作的读解,向读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读者必须时刻牢记他所织就的构成整体篇章之错综复杂结构的千丝万缕的线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么说[viii]并不过分: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展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里所言的妙处。亚里士多德将戏剧的情节和活东西^②相比较,认为活东西的美不仅依靠各部分的排列组合,也依靠体积的一定大小,这种大小能使整体的设计被视为一个整体。

对我们来说,将这些研究集萃在一起,表达了一种深沉的谢意。因为在此,伯纳德特是我们的指引。当然,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常常如此。在这本文集最后一篇文章中,伯纳德特勾勒了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治学特色,而这些特色看来也构成了他自己著作的特点。伯纳德特的高尚思想,初时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过分谦虚,但这种高尚却指出了这样一种悖论性体验:我们的理解活动只有是为了自己时,才能从他人身上学得东西,尽管我们过后会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在他人指引下前进。以上体验存在于像解释活动这样的哲学实践的最深处。而伯纳德特的实践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他所获得的理解的深度。依靠一种敏

① [译按]此文集译为《情节中的论辩》。

② [译按]活东西或可解为画像,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页25注2。

锐的能力,他穿透事物的表象,这反过来又让他看清是什么俗障掩盖了表层。通过让我们重忆表象后的潜藏物,这些文章和伯纳德特的其他论著一起,作为一个整体,例示了他曾谓的“美的存在”(the being of the beautiful)。

致 谢

我们曾和伯纳德特商讨过将哪些文章收入此集,以及所收文章如何排序。我们还想对他允许我们收录已发表过的文章表示谢意。这在后面参考书目列出的伯纳德特论著中有特别的标记。埃尔哈特基金(Earhart Foundation)资助了我们的筹备工作。我们还想感谢负责文稿录入的维塔基(Barbara Witucki),另要感谢伯曼(Robert Berman),他的意见总是非常有价值。

导 言

严蓓雯 译

[ix]对伯纳德特来说,只要钻研足够深入,任何特别的问题都会引向哲学问题,而且,“‘哲学是什么’似乎与如何阅读柏拉图这一问题密不可分”。^①因此,伯纳德特的论著通常被认为和阐述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有关。毫无疑问,这个文集里超过一半的文章是读解柏拉图的。但同时,因为又有将近一半的文章无关柏拉图,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20篇谈论古希腊诗和哲学的文章可以被称为是一个整体呢?

诗人代表了“对城邦特别是其政治基础的理解,对法特别是神圣法的理解,而如果不是柏拉图带来的光明,这种理解将仍处于黑暗之中”。^②因为柏拉图对话录将深埋在诗人故事里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位于法律边界另一边的灵魂的体验”^③——提高到论证的高度,所以,它们给了伯纳德特一把揭开那些故事意义的锁钥。然而,这恰又从一种形式显示出,柏拉图对

① 《施特劳斯论柏拉图》(Struass on Plato),页407。([译按]此处页码均指原书页码,下同。)

② 同上,页415。因此,希腊悲剧的“双重框架”是“它合法自治的政治框架和它颠覆这种合法状态的神圣框架”(《论希腊悲剧》[“On Greek Tragedy”],页103)。

③ 《论希腊悲剧》,页104。

话是如何深深受惠于作为诗的戏剧。^① 要找到从柏拉图到诗人的路径,需要认知从诗人到柏拉图之途;伯纳德特可以如此充分地利用其一,因为他是如此熟悉其二。

在伯纳德特面前呈现了哲学传统里如此万千之景,所以,对他来说,通往诗的道路存在于悲剧之中,而悲剧“似乎宣称它自己就是生活的真谛”。^② 对这个真理的通常表述是“智慧自苦难中得来”(pathei mathos)^③——从痛苦、体验或遭受中学习。^④ 这句话典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Agamemnon,行177),由合唱队唱出,表达了人类理解活动的普遍情形。大体而言,诗,特别是戏剧诗,虽然呈现给我们一种虚幻的体验,但我们却从中领悟到某种真相。我们不必为了理解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去犯下乱伦之罪,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为了窃取它的教义而轻率跳至此剧的结局,因为我们最后的所获,取决于[x]我们在

① 例如,《王制》(Republic)第四章中苏格拉底对灵魂的三分法,提供了一种线索,表明跟赫西俄德《神谱》(Theogony)形态的关联(见文集第一篇《最初哲学的最初危机》)。伯纳德特还提出了其他一些线索:比如在第俄提玛(Diotima)的“爱的阶梯”中提到《伊利亚特》的情节;在分析《王制》中贯穿的愤怒与理性时探讨与奥德修斯(Odysseus)的性格的关系;在解释《王制》第九章僭主时指涉《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王制》第六章分线喻与希罗多德《原史》(Inquiries)结构的关联;《斐多》(Phaedo)对身体和灵魂的解释与安提戈涅(Antigone)埋葬她兄弟的尸体的关系等等。当然,在每个例子中,柏拉图的“模板”自身深嵌在对话言辞的动态展开中,同样也存在于为之提供线索的作品情节中。

② 《论希腊悲剧》,页99。

③ [译按]此处翻译参考罗念生先生所译《阿伽门农》(《古希腊戏剧选》,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页63)。

④ “智慧自苦难中得来”这句话的意思由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生动体现出来。虽然普罗米修斯知道如果违抗宙斯就要受到惩罚,但他不能事先知道在惩罚过程中会经受什么。伯纳德特提出这种模式,向我们表明,从宇宙的预言性科学中会遗失什么。在《卡尔米德》(Charmides)里,苏格拉底和克里提阿(Critias)一起研究这种宇宙的预言性科学;通过消解错误,它也将悲剧智慧的任何可能的哲学对应物一起给消除了(见文集第十二篇《释论柏拉图的〈卡尔米德〉》[“On Interpreting Plato's Charmides”],页12)。

最初和之中的体验。因此,故事或情节是“悲剧之魂”。^①

然而,“智慧自苦难中得来”肯定比这切入更深。对伯纳德特来说,悲剧的最初困局在于情节和性格之间的张力:俄狄浦斯(Oedipus)的命运看上去无法避免,但他似乎并不命该如此。^② 俄狄浦斯的故事——弑父娶母——可以理解成他性格的象征——他任性地想要成为他自己,这么来看,情节和性格这两者最初也许是一致的。而两者之间开始发生的歧异就因此使我们转而重新估量俄狄浦斯的性格。即从某一方面来看,就诗而言,他获此结局是正义的,而且看来也似乎让这出戏剧更显美丽。然而,在伯纳德特的引导下,我们却发现了令人困扰的细节:完美的情节开始瓦解。俄狄浦斯抵达忒拜(Thebes),在伊俄卡斯忒(Jocasta)能知道拉伊奥斯(Laius)已死之前与她成了亲。接着,他解开人面狮身怪兽斯芬克斯(Sphinx)之谜,将忒拜从几乎刚开始的瘟疫中解救出来——俄狄浦斯甚至有可能是斯芬克斯第一个与之对话的人。思考一下这样的困难后,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俄狄浦斯——愤怒和任性让他忽略了情节的难度(比如说目睹拉伊奥斯被杀的那个人声称他的同伴遭到了一伙强盗的袭击,而当时,俄狄浦斯是一个人);想要获知真相的欲望让他热切接受了那个结局(那个结局很难说真实)——导致了这一切;相反,是忒拜本身所为所致,或者说,不仅仅是忒拜。我们自身的任意而为也纠缠其中。我们被看似完美的情节裹挟而过,以至于抑制了对没有结合在一起的难解细节的认识。就像伯纳德特非常生动形象地指出的,事物展开的方式中有着“暗门”(trapdoors)。^③ 如果我们睁大双眼,设法穿过《俄狄浦斯王》

① 见《诗学》,1450a-b,亚里士多德将情节视为“悲剧的灵魂”。伯纳德特对希腊悲剧的思考,引导他称冥府(Hades)——*Aïdes*是其悲剧形式——为“悲剧的灵魂”(《论希腊悲剧》,页141以下)。这两种看法乍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情节的突出性就是将不可见(*aïdes*,[译按]这个词的原意是隐形的、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那种需要的征象。

② 见文集第七篇《论希腊悲剧》。

③ 《施特劳斯论柏拉图》,页410。

情节中的暗门,会发现整出戏剧别有意味,跟我们起初认为的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剧,而且是政治生活本身的悲剧——只有我们原先忽视了这一点,而且被“显见”蒙蔽了双目,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这个认识。^① 要得到智慧,我们必须先历经错误,因为对事物的认识实际上就在于揭示潜藏在这样错误下的原由。智慧自苦难中得来。

哲学也反映出相同的模式:柏拉图对话通过体现苏格拉底哲学,将这模式主题化了。伯纳德特在柏拉图对话中发现的,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悲剧的“复杂的情节”(complex plot)相似,即每一事件必须是另一事件的结果,而且和期望的相反。^② 更明确点说,“发现”和“突转”的功能——悲剧情节以它们为支点——在柏拉图[xi]对话中找到了它哲学上的对应。^③ 因此,将对话的形式结构说成是一个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是不充分的;这个结构还必须和论证的一步步展开连在一起理解,这种论证——不是不顾情节的突转,而正是因为这突转——最终可以证明它受控于一个更深的必要性。^④

① 在《论希腊悲剧》对《俄狄浦斯王》的讨论中(见文集第七篇),伯纳德特带着基本的逻辑推论重新思考了他早期对这出戏剧的读解(见文集第五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Sophocles’ *Oedipus Tyrannus*”],页5),尤其更为留意那些“显见”的复杂情况。

② 见 Aristotle,《诗学》,第10-11章。

③ 《论柏拉图的〈智术师〉》(On Plato’s *Sophist*),页343。

④ 在《斐德若》(*Phaedrus*)中,当苏格拉底将“语义必要性”作为书面写作的标准时,它似乎是在换一种方式表述,以活东西作为模式,这些活东西的各个部分从来也不会是多余之物,而是和每一部分及整体恰宜地关联在一起(《斐德若》264b-c)。然而,对伯纳德特来说,当活东西是作品结构的模式、是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时,语义必要性指的是时间顺序,论证的每一步紧接着上一步(见他的《道德和哲学的修辞: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和〈斐德若〉》[*The Rhetoric of Morality and Philosophy: Plato’s “Gorgias” and “Phaedr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页176-77)。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通过对爱欲的两次讨论,展示了文章与活东西两者之间的关联:后者紧接着前者,是对前者的“改变论调”(recantation),然而,在这种变调中,由作为部分的两次谈论一起组成的整体被照亮了。而且,伯纳德特认为,从《泰阿泰德》、《智术师》到《治邦者》的这个趋向,说明这种关联也存在于这些对话之间。这种运动使得篇章独立的对话成为更大整体的各部分(参见伯纳德特对这些对话的每一篇的讨论结论,文集第十五、十六、十七篇)。

当然,存在着一个已有的现代习见,认为柏拉图对话有一个文学形式,其特征是言辞和行为的并置,两者都应该根据对方作出解读。这种传统见解坚持对话的内容和形式密不可分,由此认为,除非是在恰当的位置中,否则,没有一个命题可以被正确理解。这种看法意识到必须根据发言者来理解对话中的言辞,意识到柏拉图对矛盾的精妙使用是种文学技巧,而且克制着不要做出这样的表述:他比柏拉图本人更理解他。^①然而,如果这样的解释假设柏拉图对话在它的读者中产生出不同理解水平的集合体,且只有深度的差别,在质上并无不同,那么,它在决定性方面暴露出缺陷;因为“一旦论点和行动恰当地放在一起,一个完全崭新的主题便浮出水面,这是在书页上永远无法期获得到的主题”。^②就是这个通过行动自身体现出来的新主题,让柏拉图对话成为一个整体。伯纳德特再现了这个主题,揭示出每个对话如何在本质上重现了洞穴中哲人的转向(*periagōgē*),他从面对墙上阴影的位置,用力地扭转身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迎向光亮。

在显白论证的进程中有个有意的缺陷——柏拉图的“暗门”——它牵引我们潜入表层底下,曝光揭示了真正辩题的行动

① 这些源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柏拉图研究导言中的解释学原则,很可能存在于施特劳斯归于施氏的“对柏拉图文学技巧的极其重要的五或六个真正评论”中(见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柏拉图对话导论》[*Introductions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 New York: Arno Press, 1973], 页1-19;以及施特劳斯的文章《显白的教诲》(Exoteric Teachings),重载于Thomas Pangle编并撰序,《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施特劳斯论文与讲演集》[*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页67)。施莱尔马赫认为,在那些留心到柏拉图文学技巧的读者和未留意之的读者之间,只有理解程度的不同;施特劳斯则反对说,这正是施莱尔马赫没有认识到以下这点的体现:在解释的不同中,存在着某种根本的断裂,根据柏拉图的看法,这种断裂区分了普通人对事物的理解和哲人对事物的理解。而伯纳德特的读解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在那些说明了这种根本断裂的对话中勾勒哲学动态进程的方式。

② 《施特劳斯论柏拉图》,页409。

动因。^①《斐多》就是鲜明例子。在柏拉图著作最著名的一个章节中,苏格拉底充满理性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意图来解释他“寻找原因的第二次航行”(99d)。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认为心灵是所有事物的原因,而据苏格拉底所言,他抛弃了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因为心灵并不能解释它所强置的秩序的善好。苏格拉底用自身境遇作为例子,证明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观不能解释的情形。为了解释他为何身陷囹圄、没有奔向去往麦加拉(Megara)之路,我们必须明白,苏格拉底留在监狱、饮鸩而死,对他自己和雅典人民来说似乎都更好一些。但其间苏格拉底的理由和雅典人民的理由看上去却是同一后果的相反原因:

如果苏格拉底靠心做了想做之事,雅典人就没能靠心做成他们想做之事,否则,[xii]在通过相反之途达致相同结论的过程中,心灵是不理智的。^②

① 伯纳德特的语言学分析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对柏拉图对话语言中情节论证的思考。当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通过建议找到一个 *kata noun* [合自己意] 的情人而结束自己关于爱欲的一番话时,他的意思是“随自己所喜欢的”(as one likes);但是,就像伯纳德特发现的,在字面上,阿里斯托芬说的是“根据头脑判断的”(according to mind)。在对这双重含义的警觉中,我们发现,柏拉图抓住了阿里斯托芬的这句措辞,它反映了阿里斯托芬对爱欲的困惑理解:在与“人的理性相脱离”中,爱欲追求“某种缺乏可理解性的完整”(见本书《论柏拉图的会饮》[On Plato's *Symposium*], 页 175)。在《斐勒布》(Philebus)的开篇,同样的表达再次出现。在这篇对话里,苏格拉底要求他的对话者为“快乐而不是思想是人类幸福的原因”这种说法辩护——除非他找到了其他“合自己意”的观点。伯纳德特一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发现,通过展示思想和快乐无法分离地纠缠在一起——享乐主义和知性主义的抽象概念都否认这一点——语言本身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论点(见《生活的悲喜剧:柏拉图的〈斐勒布〉》[The Tragedy and Comedy of Life: Plato's "Phileb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I, 注释 2)。

② Seth Benardete,《苏格拉底的再次起航:柏拉图〈王制〉疏证》(Socrates'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页 3。